



## 国际侨汇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国外学术观点综述

林 勇

(福建社会科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所, 福建 福州 350001)

[关键词] 侨汇研究; 国际侨汇; 国际移民; 公共投资; 国际贸易; 荷兰病; 道德风险; 脑力流失

[摘要] 论文从侨汇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侨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侨汇的危机救助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侨汇对公共投资和官方援助的影响、侨汇的“道德风险”和侨汇对人才流失的影响、侨汇对荷兰病和国际贸易的影响等六个方面, 对国外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阐述, 认为前期的研究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开拓性成果和坚实基础, 但是目前国际侨汇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别和微观的领域, 在宏观综合分析、比较分析和理论探索方面还比较欠缺, 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探索, 不少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 因此还有许多问题亟需做进一步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3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 (2011) 01-0064-013

###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upon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Migrants' Originating Countries: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Relevant Western Scholarship

LIN Yong

(Institute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Key words:** migrant remittance study;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ublic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trade; Dutch disease; moral hazard; brain drain

**Abstract:** The author summarily reviews the Western scholarship concerning the impacts of remittances by migrants upon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their originating countries,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come distributio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ve investment, crisis relief, economic growth, public investment, government assistance, and negative byproducts of “moral hazard”, “brain drain”, and “Dutch disease”. He affirms the Western scholars' contributions in terms of taking the lead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this academic field, but points out that, thoug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ttained by micro-studies of individual countries, more work is yet to be done with comparative macro-studies and theorization.

[收稿日期] 2010-07-10; [修回日期] 2011-01-11

[作者简介] 林勇 (1965—), 男, 博士, 福建社会科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国际移民、华侨华人问题。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移民与经济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侨汇是其中涉及最多的主题之一。国际侨汇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但直到 2003 年世界银行《全球金融报告》发表后，侨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才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1997—2007 年间，全球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侨汇年均增长率在 15% 左右，总量由 700 亿美元增长到了 2890 亿美元。<sup>[1]</sup>侨汇的迅速增长对移民来源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侨汇与来源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从减贫、分配、消费、投资、增长等方面面对侨汇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诸多探讨，积累了初步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本文拟对国外的一些学术观点进行简单介绍和评述，从而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 一、侨汇对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 （一）侨汇与贫困

首先，多数学者对侨汇的直接减贫作用持肯定意见。<sup>[2]</sup>侨汇直接由移民汇到家人或朋友手中，减贫效果十分直接、明显。<sup>[3]</sup>亦即侨汇通过提高移民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从而直接减少贫困，具有直接减贫的作用。

Page 等学者对 74 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移民人口每增加 10%，贫困人口就会减少 1.9%；侨汇占 GDP 的比例每增加 10%，贫困将减少 1.6%。<sup>[4]</sup>Calderón 等 2008 年对拉美的考察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侨汇与 GDP 的比例每增加 1%，贫困率就会减少 0.4%。<sup>[5]</sup>Zachariah 等 2003 年对印度的研究发现，2000 年喀拉拉邦收到来自海湾国家的侨汇达 30 亿美元，使本地区贫困人口减少了 12%。<sup>[6]</sup>许多国家的移民多来自农村地区，侨汇对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更加显著。<sup>[7]</sup>比如阿尔巴尼亚全国约 26% 的家庭有侨汇收入，而农村家庭的侨汇收入占全国侨汇的 64%；该国平均每个家庭侨汇收入近 1800 欧元，90% 的侨汇收入直接作为家庭开支，对于提高家庭收入和减少贫困作用明显。<sup>[8]</sup>从这些实证研究结果看，侨汇的减贫效果是比较显著的。侨汇减贫效应与政府的许多减贫、教育、卫生保健和营养等计划的效应同样巨大，而且侨汇的直接减贫效应在危机和动乱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后菲律宾侨汇迅速增加，避免了众多家庭陷于贫困处境。<sup>[9]</sup>

其次，部分学者对侨汇的减贫效果持怀疑态度。Acosta 等就认为拉美侨汇的减贫效果并不明显，<sup>[10]</sup>同时，Lopez-Cordova 和 Olmedo 也持相同观点，并且指出不同的贫困概念和贫困标准对这类评价影响很大。<sup>[11]</sup>

第三，侨汇的减贫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一是移民来源国贫困状况。如果来源国贫困率本身较高，那么侨汇减贫效果就比较显著；随着贫困率的降低，侨汇的减贫效果就愈加不明显。<sup>[12]</sup>二是侨汇的分布状况。侨汇流入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或地区，对贫困的影响大相径庭。如果侨汇主要流向中高收入家庭，则该地区穷者愈穷、富者愈富，不利于减贫。移民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也同样重要。由于移民出国往往需要一大笔钱，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学历要求，许多贫困家庭往往望而却步。一般来说，能够顺利出国而且有能力汇钱回国的人通常要具备一定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由于经济能力和受教育水平较差，贫困家庭在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国外生存能力等方面都更弱一些。三是移民阶段。一个地区在移民初期往往富裕家庭才有能力出国，因而侨汇往往会加剧该地区的贫富差距，不利减贫。<sup>[13]</sup>但是从长期看，随着移民活动逐渐成熟，移民网络能提供移民信息和帮助，促使更多的贫困人群移民海外，来自他们的侨汇逐渐增加，从而促使该地区减少贫困，缩小收入差距。

当然，在不同国家，由于侨汇分布各不相同，其减贫作用也有差别。此外，影响侨汇减贫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移民来源国的政策引导、宏观环境等，只是相关研究还十分缺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第四，侨汇的间接减贫作用值得进一步关注。目前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侨汇的直接减贫作用，事实上，侨汇还通过其他间接途径达到减贫效果，比如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生产性投资、增加就业机会和增加人力资源投资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于侨汇间接减贫的研究还较少。笔者认为，侨汇通过改善收入水平影响贫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也只是暂时性的。这种状况下侨汇只是起到了“输血”的作用，容易反弹：一旦侨汇减少贫困迅速增加。Calderon 等人的研究表明，侨汇的减少会导致拉美贫困率增加 5% ~ 12.2%。<sup>[14]</sup>因此，侨汇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原因，它的作用比较脆弱。如果侨汇能更多地通过其他间接方式，变“输血”为“造血”，促进当地经济结构的转变，其缩小收入差距、减少相对贫困的效果就会更好、更持久。因此，要长期解决贫困问题，各国需要在经济结构改革、金融改革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从而充分发挥侨汇的间接减贫作用。

## （二）侨汇与收入分配

侨汇能显著改善移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侨汇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情况怎么样？它对收入分配带来了什么影响？哪些因素影响了侨汇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不同学者对不同国家的研究结果呈现出差别。

首先，侨汇更多地流入贫困还是富裕家庭或群体，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截然不同。如果是后者，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Koc 和 Onan 对土耳其的研究发现只有 5% ~ 20% 的侨汇接收家庭是贫困家庭；<sup>[15]</sup> Saith 通过对菲律宾的研究发现，侨汇扩大了地区、行业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sup>[16]</sup> Adams 对巴基斯坦的考察也认为侨汇扩大了收入差距。<sup>[17]</sup>但是，如果是前者，就可以缩小收入差距。Rodrigo 和 Jayatissa 对巴基斯坦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sup>[18]</sup>另外，Taylor 发现墨西哥侨汇主要流入农村地区和贫困人群，缩小收入差距效果比较明显。<sup>[19]</sup>但是，即使是同属拉美地区，不同国家侨汇分配及其对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也有差别，<sup>[20]</sup>如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拉圭，侨汇主要流入贫困人群，<sup>[21]</sup>而海地、秘鲁和尼加拉瓜则相反，富裕人群的侨汇收入更多。<sup>[22]</sup>

其次，不同移民群体的侨汇倾向和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侨汇对收入分配产生的作用。研究表明，非技术和低技术移民的侨汇倾向显著高于高技术移民。<sup>[23]</sup>低技术移民往往来自贫困家庭，而高技术移民则来自富裕家庭。一般而言，相对于富裕家庭，贫困家庭对侨汇依赖性更大，侨汇倾向较高；而高技术移民比较容易全家移民，与来源国联系相对较少，侨汇倾向较低。<sup>[24]</sup>因此，如果低技术移民比例较高，则侨汇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就是积极的。相反，如果高技术移民所占比例越大，侨汇的增加将扩大收入差距。<sup>[25]</sup>某些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更偏好高技术、高学历移民，这种政策上的导向性使侨汇更容易集中在收入本来就较高的群体，这类侨汇就有可能扩大收入差距。

再次，不同移民阶段侨汇影响收入的效果也不一样。如前所述，在移民活动初期，侨汇往往会扩大某一地区的贫富差距。这是因为最早出国的移民通常来自能够负担移民费用的富裕家庭。<sup>[26]</sup>移民初期富裕群体更容易出国，然后赚得侨汇，帮助家人出国……如此的循环往复使本地区的收入分配更加恶化。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本地移民网络或移民链的形成，移民成本逐渐减少，贫困家庭也逐渐能够负担出国费用。<sup>[27]</sup>大量的贫困人口包括妇女有能力移民海外，更多贫困家庭有了侨汇收入，这将最终缩小本地区的收入差距。因此，长期而言，侨汇将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第四，侨汇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还受到另外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移民来源国收入差距状况。如果某地区原本收入差距就很大，则短期内侨汇会加大收入差距。如果情况相反，则侨汇的增加会缩小收入差距。<sup>[28]</sup>二是移民费用。通常是移民费用越高则贫困家庭移民的可能性就越低，从而流入贫困家庭的侨汇自然就少，收入差距就会扩大。也就是说，移民费用越高，侨汇扩大移民来源国收入差距的可能性就越大。<sup>[29]</sup>

## 二、侨汇对消费和投资的影响

### （一）侨汇与消费

侨汇的最终去向问题，即侨汇进入消费、储蓄还是投资领域，是侨汇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中的重要一环。从侨汇的使用分配来看，目前依然主要用于基本生活需要，如食物、房租、医疗、教育等，<sup>[30]</sup>“（目前）侨汇倾向于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生产性投资”。<sup>[31]</sup>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侨汇平均达 60%~78%，其中墨西哥 78% 的侨汇用于基本生活消费，厄瓜多尔 61% 的侨汇用于此用途。<sup>[32]</sup>侨汇主要用于基本生活消费表明接收侨汇的家庭收入较低，其基本生活对侨汇依赖性很大。

关于消费是浪费侨汇的观点招致了批判。由于只有少部分的侨汇用于兴办中小企业、改善农业劳动效率等生产性投资，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学界和政府一度对侨汇能否促进经济发展产生了怀疑。这种观点似乎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除了直接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以外，侨汇还通过其他许多渠道进入投资：侨汇储蓄转为贷款、消费刺激国内生产性投资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人力资源投资、利用侨汇从国外进口投资性产品和生产设备，等等。近些年，有学者对侨汇的用途被区分为消费和投资的作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侨汇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的“消费”，应该被当作是人力资源投资而非普通的消费，而贫困家庭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应该被视为侨汇减贫的作用体现而非单纯的“消费”。<sup>[33]</sup>

在一定条件下，国际侨汇大量涌入，通过消费促进需求、产出、储蓄和投资，侨汇的“乘数效应”由此产生。Massey 认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侨汇的乘数效应高达 4 美元，即每一个美元的侨汇在当地会产生 4 美元的商品和服务需求。<sup>[34]</sup>Glytsos 认为一个单位的侨汇平均可以增加 2.3 个单位的收入、0.6 个单位的投资。<sup>[35]</sup>埃及每增加 1000 万美元侨汇，GNP 就会增长 2200 万美元。墨西哥 20 亿侨汇收入估计新增价值 65 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占 GDP 的 3%。Adelman 和 Taylor 对墨西哥的研究结论是：每吸纳一个美元的侨汇，GNP 就会增加 2.69~3.17 美元。<sup>[36]</sup>

是不是侨汇用于消费就一定会产生乘数效应呢？不一定。因为乘数效应只是侨汇潜在的一种功能，它的产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生活消费品并非国产而是进口的，这种情况之下侨汇用于消费不仅乘数效应受到了局限，反倒会刺激进口，增加贸易逆差。比如流入阿尔巴尼亚的侨汇多数都用于购买进口消费品。<sup>[37]</sup>同时，农村地区的居民往往用侨汇从小商小贩处购买商品，销售环节并未缴税，其乘数效应就大打折扣。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侨汇促进了消费，但消费的急剧扩大还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

### （二）侨汇与投资

如果将进入房地产和教育、医疗卫生领域的侨汇计入消费而不是投资的话，目前进入生产性投资的侨汇最多在 10% 左右。<sup>[38]</sup>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以投资为目的的侨汇比例不到 5%，而收款人用侨汇投资的比例相对更高一点，可能在 10% 左右。<sup>[39]</sup>但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上述几类“消费”也作为“投资”来考察，将储蓄也看作是侨汇进入投资的重要渠道。

首先，侨汇是中小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学者普遍认为侨汇对于促进中小企业投资有积极作用。Leichtman 对摩洛哥的研究表明侨汇往往投资于中小企业，用于购买小货车、出租车，投资咖啡店、旅行社、饭馆和酒店，<sup>[40]</sup>该国里弗（Rif）地区由侨汇投资的建筑业和中小企业促进了当地的城镇化。<sup>[41]</sup>墨西哥出国移民最多的前 6 个州的中小企业投资 21% 来自侨汇。<sup>[42]</sup>土耳其约有一半的移民都在国内投资兴办企业，其启动资本都来自于海外侨汇。<sup>[43]</sup>南太平洋岛国的侨汇也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国内投资。<sup>[44]</sup>

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支持中小企业和农业发展方面仍存在着诸多困难，比如价格和技术支持、贴息贷款等。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不太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或者提供的金融支持十分有限。侨

汇恰好弥补了这些方面的不足。

在这些国家，侨汇进入投资领域目前还存在不少障碍。侨汇接收国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吸引侨汇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只要出现机会，侨汇就会用于投资，投资对于侨汇有吸引力。但是，即使移民本人具备投资和管理能力，如果投资环境不好的话，移民不会选择投资国内，而宁愿选择在其他更安全的地方投资”。<sup>[45]</sup>鼓励侨汇投资的措施必须与有益于经济增长和提升竞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结合起来。良好的投资环境将使侨汇更多地进入实体经济和人力资源投资。

其次，侨汇是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补充。侨汇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促进了家乡儿童入学率的提高。对墨西哥的个案研究表明，吸收侨汇的家庭比例每增加5个百分点，儿童入学率就会增加3%以上，文盲就会减少34%。Ratha发现萨尔瓦多和斯里兰卡家庭有侨汇收入的学生辍学率很低，聘请家庭教师的也更多。<sup>[46]</sup>在遭受经济衰退或其他灾难后，发展中国家的非侨汇接收家庭往往收入减少，子女无法继续读书，而接收侨汇家庭的子女则能继续学业。Yang对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菲律宾家庭开支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侨汇对于提高菲律宾儿童入学率起到了积极作用。他指出，在货币升值幅度较大（相对于菲律宾比索）国家的菲律宾移民，在子女教育方面的开支增长很快。<sup>[47]</sup>随着有侨汇收入家庭比例的增加，菲律宾6~14岁孩子的入学率就明显增加。<sup>[48]</sup>而且，侨汇流入贫困家庭比例越高，当地女孩接受教育的比例增加就越快。<sup>[49]</sup>

侨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民众尤其是儿童健康水平的提高。相比其他收入，侨汇收入的增加更能促进墨西哥家庭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sup>[50]</sup>随着侨汇收入家庭比例的提高，墨西哥婴儿死亡率下降了。<sup>[51]</sup>斯里兰卡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出生的婴儿体重大于普通家庭。<sup>[52]</sup>

如上所述，侨汇对人力资源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都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要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来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更清晰的认识，不宜过分强调侨汇的这种替代功能，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投资和中小企业投资不能过于依赖侨汇。

第三，大量侨汇进入了房地产领域。相当部分侨汇都用于购置房产，侨汇对发展中国家房地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侨户和侨乡收入水平普遍提高、基本生活消费得到一定满足的情况下，侨汇进入房地产投资甚至生产性投资领域的就逐渐增加。巴基斯坦农村的侨汇相当部分用于投资房地产，<sup>[53]</sup>摩洛哥Rif地区71%的移民家庭都用侨汇来购买土地建房或用于旧房翻新。<sup>[54]</sup>Parrado发现，去美国打工一年的人回乡购房的可能性将增加1.2倍，在美国每多工作一年，购房的可能性就增加2.8%。<sup>[55]</sup>大量侨汇进入房地产，不仅带动了与此相关的多种行业的蓬勃发展，比如塑胶、五金、家具、水电、照明和家电等，还促进了就业的迅速增长。<sup>[56]</sup>因此，侨汇进入房地产同样能发挥其“乘数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第四，储蓄成为侨汇进入投资领域的重要渠道。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储蓄率普遍高于没有侨汇收入的家庭，而且侨汇的储蓄比例也高于其他收入的储蓄比例。<sup>[57]</sup>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巴基斯坦海外侨汇储蓄倾向明显高于国内汇款（从城市向农村的汇款）或租金收入。<sup>[58]</sup>Obstfeld等指出，侨汇增加了居民储蓄，带动了投资。<sup>[59]</sup>Malik和Sarwar分析了1987—1988年巴勒斯坦的侨汇消费情况，结果发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侨汇都用于消费，不少侨汇用于储蓄和投资，<sup>[60]</sup>用于投资和储蓄的侨汇比例甚至达到了68%。<sup>[61]</sup>但多米尼加、海地、尼加拉瓜、哥斯达尼加和秘鲁，侨汇只有不到18%用于储蓄。<sup>[62]</sup>究竟有多少侨汇储蓄进入了投资领域？目前对此问题似乎还缺乏研究。

### 三、侨汇的危机救助作用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一）侨汇与危机救助

每当移民来源国遭受经济危机、自然灾害以及国内政局动荡之时，侨汇都会增加，因此侨汇起到了一种支援和救助的作用。<sup>[63]</sup>这一点基本上已经成为学界共识。

侨汇的救助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危机时期。第一种是自然灾害。1846—1848年的大饥荒之后，因为有在美国做家庭佣人的妇女汇回的侨汇，爱尔兰的农村居民才得以生存下来。20世纪以来，孟加拉、多米尼加、海地、洪都拉斯在遭受自然灾害以后侨汇激增。<sup>[64]</sup>2004年东南亚海啸发生后，东南亚的海外侨民纷纷往回汇款，对救灾起到了重要作用。每次飓风过后，受影响的移民来源国增加的侨汇，当年就能够弥补收入损失的13%，4年之内能弥补28%。<sup>[65]</sup>海地地震后海外移民汇回大量侨汇施以援助。<sup>[66]</sup>第二种是战争或动乱。科特迪瓦在内战期间侨汇源源不断流入，塞拉利昂国内武装冲突后侨汇也增加了，侨汇为黎巴嫩内战中遭受伤害的人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援。<sup>[67]</sup>第三种是经济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侨汇成为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发展的关键资源。<sup>[68]</sup>1995—2004年间，虽然流入亚洲的FDI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侨汇却增长了3倍。1997年阿尔巴尼亚遭受经济危机后，几乎全靠侨汇帮助，其经济才能在1998年得以复苏。这些都说明在移民来源国遭受特殊困难时，侨汇具有及时救助作用。目前学界需要探讨如何将侨汇这种短期的救助功能，转化为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和动力。

## （二）侨汇与经济增长

侨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复杂，侨汇对经济增长是否有影响迄今也存在争议。不少学者持肯定观点，同样，许多学者持怀疑态度。

有学者认为，侨汇与经济长期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IMF对101个发展中国家在1970—2003年间的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侨汇与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关联并不显著。<sup>[69]</sup>Chami等人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侨汇既没有促进投资的增长，也没有影响投资的分配，因此对GDP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sup>[70]</sup>

Faini认为侨汇能克服资本市场的缺陷，使移民家庭有效集聚资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sup>[71]</sup>侨汇有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多数来自于对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实证研究。Mishra指出，在13个加勒比国家中，侨汇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私人投资就会增长0.6个百分点，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sup>[72]</sup>Solimano的研究表明，侨汇对安第斯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sup>[73]</sup>Giuliano和Ruis-Arranz则发现在金融业比较落后的国家，侨汇能缓解信用限制，起到了促进金融发展的替代物作用，对于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sup>[74]</sup>

侨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依然值得关注。Chami等对113个国家29年间的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侨汇降低了侨汇接受者的劳动积极性，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sup>[75]</sup>当然，如果侨汇主要流入贫困家庭，侨汇更多用于基本生活消费而非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有限。而且，与侨汇相关的消费是否导致进口增长或通货膨胀，是否导致国内生产的减少，也会影响侨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sup>[76]</sup>侨汇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完全抵消其积极作用。<sup>[77]</sup>

侨汇来源地不同，侨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差别。如果侨汇更多来自发达国家，则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就会更显著。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移民，因工作条件更差，工资较低，居留时间更短，侨汇也更少。<sup>[78]</sup>目前这类比较研究成果很少，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侨汇的变动不居，在短期和长期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短期看，侨汇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但长期看可能这种作用并不明显，<sup>[79]</sup>所以我们应该更多探讨侨汇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侨汇对移民来源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它在有效需求、投资和出口、通货膨胀、经济结构的转变等诸多方面的作用。因此，侨汇对长期经济增长作用的评价，要全面考察上述各方面的综合表现，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

## 四、侨汇对公共投资和官方援助的影响

### （一）侨汇与公共投资

移民用侨汇在家乡投资诊所、自来水、水利设施，修建道路、学校等，为移民来源国的公共

投资提供了大力支持，获得普遍称赞。

墨西哥的“同乡会”组织在筹集和引导侨汇在家乡建设公共工程和投资中小企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sup>[80]</sup>萨卡特卡斯州政府从1993年开始实施“二配一”计划，即移民社团在家乡每投入一个美元，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各配套一个美元。到1997年该项计划扩展为“三配一”计划，又加上了当地政府的配套资金。萨卡特卡斯的移民社团在8年多的时间里投资了400多家公共工程和中小企业（约合450万美元）。2005年，墨西哥移民社团在全国范围内筹集了2000万美元公共建设资金，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为此配套了6000万美元。<sup>[81]</sup>在人口少于3000人的侨乡，墨西哥移民捐赠超过政府公共投资的一半；在少于1000人的侨乡，移民捐赠甚至相当于政府公共投资的7倍。萨尔瓦多的国家开发机构FISDL也实施了一个类似的计划，由政府为移民社团在家乡的投资进行配套。<sup>[82]</sup>

尽管如此，利用侨汇兴建公共工程对当地发展的作用也受到了部分学者的怀疑。有学者注意到，由于侨汇投资兴建的许多公共设施都缺乏科学规划，没有适应当地民众的实际需要，缺乏后期维护，造成严重浪费。另外，由侨汇兴办的职业培训机构培训的工人多数意在出国，客观上造成了本地劳动力的流失。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政府行为，有没有因为侨汇进入公共领域而受到影响？侨汇在部分解决了经济发展瓶颈的同时，是否使政府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侨汇的依赖，从而导致政府在公共领域投入减少，即侨汇进入公共投资会不会对政府的公共投资产生“挤出效应”？<sup>[83]</sup>即是否会产生所谓的“公共道德风险”（public moral hazard）？如果存在公共道德风险，那么风险有多大，哪些因素影响了风险的程度？在人力资源投资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侨汇是否具有替代作用？在吸收大量稳定的侨汇收入以后，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否减少了对人力资源的投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 （二）侨汇与官方援助

侨汇是否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官方援助（ODA）产生影响，是侨汇研究领域的一项新课题。发达国家是否会因为侨汇大量流向发展中国家而削减ODA？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侨汇对ODA是否也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对侨汇的依赖程度大于ODA，如两者的比例在下列国家分别为：土耳其39:1，墨西哥34:1，哥斯达尼加24:1，牙买加15:1，菲律宾8:1，尼日利亚7:1，印度6:1，突尼斯5:1，莱索托4:1。<sup>[84]</sup>与此相反，多数撒哈拉以南国家却对援助的依赖程度更高。这类比较只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一些国家对侨汇的依赖程度，而非使人们对侨汇与官方援助产生联系。但由于1990—2003年间发展中国家ODA净流入基本没有变化，2003—2006年间才开始缓慢增长，所以就有人将ODA的变化与侨汇挂起钩来。他们认为侨汇这种“个人外援”不存在日常管理费的问题，也不会被政府官员贪污挪用，能直接进入接收人手中，效率很高。正是由于有大量如此有效的“个人外援”，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ODA已没有早先那么热情了。<sup>[85]</sup>

但是，侨汇对ODA是否具有“挤出效应”？侨汇的增加是否是ODA减少的重要原因？ODA的变化对侨汇是否真有那么敏感？侨汇对ODA的影响到了什么程度？如果真存在这种效应，发展中国家又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学界太多的关注。

# 五、侨汇的“道德风险”及其对人才流失的影响

## （一）侨汇的“道德风险”

有学者认为，侨汇导致了侨汇接收家庭和地区劳动参与率的减少，这种现象被称为侨汇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或者侨汇的“依赖文化”，即接收侨汇的家庭和地区对侨汇的高度依赖性，年轻人因为有侨汇收入而变得缺少工作热情。<sup>[86]</sup>

Chami 等认为有侨汇收入的家庭其成员不愿参加劳动，由此可能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增长。<sup>[87]</sup> 同样，Acosta 等也发现侨汇使拉美的劳动力减少了。<sup>[88]</sup> Funkhouser 则发现侨汇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要大于男性，其研究表明随着侨汇由零增长到 100 美元，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女性参加劳动的可能性减少 5%，男性减少 2.1%。<sup>[89]</sup>

侨汇是否会导致“道德风险”尚存在争议。随着青壮年男性出国，留在家里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如何评价他们的劳动参与？女性劳动参与的减少主要是因为移民家庭的家务劳动往往由妇女承担。如何估算这些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家务算不算是劳动？因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可以让结论更加客观。侨汇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地位变化产生重要影响，即侨汇有助于提高妇女地位还是会进一步加深男女不平等，需要进一步研究。

## （二）侨汇与人才流失

根据 ILO 估计，发展中国家因为“脑力流失”而损失的技术型人力资源为 10% ~ 30%。<sup>[90]</sup> 2004 年 OECD 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较不发达的小国，尤其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脑力流失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我们关心的是：人才收益（包括侨汇收入和移民在海外所获得的技术等资源）能否抵消或弥补国内因“脑力流失”而导致的损失？

一种观点认为，人才收益能部分弥补人才外流造成的损失。无论是技术移民还是非技术移民，就长期而言对其来源国都是利大于弊。世界银行 2003 年度报告指出：“虽然侨汇和移民网络效应对贸易和投资的积极贡献要远远大于技术移民造成的损失，但是发展中国家依然担心‘脑力流失’问题”。<sup>[91]</sup> 网络效应主要是指移民与其来源国之间保持的关系网络及其产生的回馈效应，比如移民回流、技术和知识的交流以及侨汇等（即人才收益）。Ratha 等人认为，从中长期看，技术工人在国外发展的网络和获得的知识以及侨汇、投资、贸易关系能使移民来源国从中受益；侨汇对来源国的积极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脑力流失”的损失。<sup>[92]</sup> 有一些国家已开始有计划地通过输出技术工人促进本国侨汇的增加，如菲律宾政府将护士的教育投资作为国家战略之一。<sup>[93]</sup> 一种更乐观的看法甚至认为，长期而言，侨汇能够减少移民压力，从而减少技术移民外流。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人才收益不能弥补高级人才和技术工人移民对国家经济造成的长期影响。他们认为，技术移民更倾向于将全家移民国外，与其来源国的联系相对较弱，汇款的人数比例更低，因此移民中技术移民比例越高，侨汇就越少。<sup>[94]</sup> 此外，他们还发现移民技术的提高对移民来源国教育水平的改善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相反，技术移民的比例与移民来源国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且，许多移民掌握的技术并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技术移民阻碍了移民来源国的经济增长。<sup>[95]</sup>

人才收益能否弥补人才外流带来的损失，目前依然存在很大争论，不少学者仍在努力寻求新的证据。普遍认为，政府培育人才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所以流失的不仅仅是人才本身，还有附着的其他许多资源。而且，国家高级人才和技术工人的流失使政府不得不进一步耗费更多资金和时间培育新的人才和工人来替代他们。由于担心更多人才外流，政府投资人力资本的积极性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从长期来看，人才收益很难弥补因人才流失带来的损失。因此，如何尽可能最大化人才收益以减少人才流失的损失，成为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

## 六、侨汇对“荷兰病”和国际贸易的影响

### （一）侨汇与“荷兰病”

“荷兰病”是指由于大量资本短时间迅速流入某国导致其货币升值，给出口造成严重影响。侨汇作为发展中国家外来资本的一种形式，如果也像其他国际资本一样在短时间内大量涌入，无疑会对汇率造成一定的冲击，从而引发“荷兰病”。萨尔瓦多、肯尼亚、摩尔多瓦等国政府就经

常担心大量侨汇的涌入会冲击汇率的变化。<sup>[96]</sup>

在侨汇占国家 GDP 比例较高的一些小国，侨汇更容易引发“荷兰病”。1979—1998 年间，拉美和加勒比 13 个国家侨汇每增加 1%，汇率就增加 0.2%。<sup>[97]</sup> Akhtar Hossain 对孟加拉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结论。<sup>[98]</sup> 同时，世界银行也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相比于侨汇，其他国际资本引发的“荷兰病”更严重。这是因为侨汇具有稳定、持续和渐增的特性。因此，侨汇对汇率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不像其他国际资本那样会引起汇率周期性的剧烈变动。相关研究目前还仅限于国别探讨，缺乏对普遍规律的分析，比如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侨汇达到什么规模（与 GDP 的比例）会引发什么程度的“荷兰病”以及如何应对，等等。

## （二）侨汇与国际贸易

一般认为，侨汇有助于外汇的增加，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大量侨汇的涌入也可能对国际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一是刺激进口需求。国外移民往往将许多外国商品带回家乡（实物侨汇），家乡人慢慢就倾向于购买和消费国外产品。回流的移民自然增加了对外国产品的需求。移民及其家人的消费偏好又会影响周围的非移民家庭的消费习惯，以此刺激进口。二是影响了贸易平衡。大量侨汇流入可能导致本币的升值，从而导致出口竞争力的下降，刺激进口增长和出口减少。Lopez-Cordova 和 Olmedo 特别考察了国际侨汇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侨汇与 GDP 的比例平均每增加 10%，发展中国家出口就会减少 2%~4%。<sup>[99]</sup> 20 世纪 70 年代末侨汇大量涌入也门甚至导致了严重的国际贸易逆差。<sup>[100]</sup> 如何发挥移民和侨汇的优势，促进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是今后研究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

总之，前期的研究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开拓性成果并打了下坚实基础，但是侨汇对移民来源国产生的影响非常广泛，因此，可以说相关研究才刚刚开始。一方面，现有成果只是涉及了其中的部分领域，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探索；另一方面，由于相关研究在宏观综合分析、比较分析以及理论探索方面还比较欠缺，不少研究结论存在较大争议，因此还有许多问题亟需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 [注释]

- [ 1 ] Dilip Ratha , Sanket Mohapatra and Ani Silwal , “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 Trends 2009: A Better-than-Expected Outcome so far , but Significant Risks Ahead ” ,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11*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9 , www. worldbank. org/prospects/migrationandremittances.
- [ 2 ] World Bank ,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6: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6 , pp. 85 - 128.
- [ 3 ] Admos Chimhowu , Jenifer Piesse and Caroline Pinder , “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Migrant Workers’ Remittances on Poverty ” , *Conference on New Directions in Impact Assessment for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Practice* ,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 November 2003 , pp. 24 - 25.
- [ 4 ] John Page and Richard Adams , “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on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 , *Remittances: Development Impact and Future Prospects* , Samuel Munzele Maimbo , Dilip Ratha ( eds. ) , Washington , DC: World Bank , 2003 , pp. 278 - 306.
- [ 5 ] Pablo Fajnzylber Calderón and J. Humberto López , “ Remittances and Growth: The Role of Complementary Policies ” ,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 Pablo Fajnzylber and J. Humberto López ( eds. )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 pp. 335 - 368.
- [ 6 ] K. C. Zachariah , E. T. Mathew and S. Irudaya Rajan , *Dynamics of Migration in Kerala: Dimensions , Differentials and Consequences* ,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Private Limited , 2003 , pp. 171 - 210.
- [ 7 ] J. Edward Taylor , Jorge Mora and Richard Adams , “ Remittances ,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vidence from Rural Mexico ” , *Agriculture and Resourc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 UCD , UC Davis , 2005.

- [ 8 ] 世界银行: 《若无侨汇, 35% 的阿尔巴尼亚人每天生活费不到 2 美元》, 2009 年 10 月 23 日, <http://al.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910/20091006577978.html>.
- [ 9 ] Dean Ya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Household Investment: Evidence from Philippine Migrants’ Exchange Rate Shock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8, Issue 528 (2008), pp. 591 – 630.
- [10] Pablo A. Acosta, Pablo Fajnzylber and Humberto Lopez,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Poverty and Human Capital: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n Household Survey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247 (June 1, 2007).
- [11] Ernesto. Lopez-Cordova and Alexandra Olmedo,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Existing Evidence, Policies, and Recommendations”, *Occasional Series Paper*, Institu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No. 41 (2006).
- [12] John Page and Jr. Richard H. Adam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Pover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3179 (December 2003).
- [13] J. Edward Tayl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urin: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8-30, June 2006).
- [14] Pablo Fajnzylber Calderón and J. Humberto López, “Remittances and Growth: The Role of Complementary Policies”,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Pablo Fajnzylber and J. Humberto López (ed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pp. 335 – 368.
- [15] Ismet Koc and Isil Onan,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on the Standard of Living of the Left-behind Families in Turke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38, No. 1 (2004), pp. 78 – 112.
- [16] Ashwani Saith, “Emigration Pressur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Cas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s*, No. 19,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1997.
- [17] Richard H Adams, “Remittances, Investment, and Rural Assets Accumulation in Pakista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47 (1998), pp. 155 – 173.
- [18] C. Rodrigo and R. A. Jayatissa, “Maximising Benefits from Labour Migration: Thailand”, *To the Gulf and Back: Studies i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Asian Labour Migration*, New Delhi: ILO/ARTEP, 1989, pp. 255 – 303.
- [19] J. Edward Taylor,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 and the Role of Remittances in the Migration Proces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37, No. 1 (1999), pp. 63 – 86.
- [20] [21] [22] Pablo Fajnzylber and J. Humberto López,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8, pp. 17 – 19.
- [23] [24] Riccardo Faini,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Growth*, Italian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and University of Brescia, 2002, pp. 1 – 15.
- [25] [27] [28] [29] Christian Ebeke and Maëlan Le Goff, “Why Migrants Remittances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In Some Countries And Not In Others?” *The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sur le Développement International*, CERDICNRS Université d’Auvergne, FRANCE, 2009.
- [26] J. Edward Taylo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urin: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28 – 30, June 2006).
- [30] 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2006: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Remittances and Migrati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6, pp. 85 – 128.
- [31] Sarah Collinson, “Shore to Shore: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Euro-Maghreb Relations”, *Middle East Programm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pp. 35 – 39.
- [32] 世界银行: 《2006 年全球经济展望: 移民及其汇款的经济影响》,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 年, 第 127 页。
- [33] Nicholas Glytsos, “Dynamic Effects of Migrant Remittances on Growth: An Econometric Model with an Application to Mediterranean Countries”, *Centre of Planning and Economic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74 (2002).

- [34] Douglas S. Massey and Emilio A. Parrad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Business Formation in Mexico",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9 (1) (March 1998), pp. 1 – 20.
- [35] Nicholas Glytsos, "The Contribution of Remittances to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32, No. 6 (2005), pp. 468 – 496.
- [36] Irma Adelman and J. Edward Taylor, "Is Structural Adjustment with a Human Face Still Possible? The Case of Mexico",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6 (1992), pp. 387 – 407.
- [37] I. Gedeshi, H. Mara and Xh Preni, "The Encouragement of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lation to the Growth of the Role of the Remittances", *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CESS)*, 2003.
- [38] 世界银行: 《若无侨汇, 35% 阿尔巴尼亚人每天生活费不到 2 美元》, 2009 年 10 月 23 日, <http://al.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910/20091006577978.html>.
- [39] Valerie Koechlin and Gianmarco León,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nd Income Inequality: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Economy Policy Reform*, Vol. 10, No. 3 (2006), pp. 123 – 141.
- [40] M. A. Leichtman, "Transforming Brain Drain into Capital Gain: Morocco's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The Journal of North African Studies*, 7 (1) (2002), pp. 109 – 137.
- [41] Sarah Collinson, "Shore to Shore: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Euro-Maghreb Relations", *Middle East Programme*,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6, pp. 35 – 39.
- [42] Douglas S. Massey and Emilio A. Parrad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Business Formation in Mexico",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9 (1) (March 1998), pp. 1 – 20.
- [43] Christian Dustmann, and Oliver Kirchkamp, "The Optimal Migration Duration and Activity Choice after Re-migr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67 (2002), pp. 351 – 372.
- [44] Richard P. C. Brown, "Estimating Remittance Functions for Pacific Island Migrant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 (1997), pp. 613 – 626.
- [45] Richard P. C. Brown, "Migrants' Remittances, Savings and Investment in the South Pacific",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Vol. 133, No. 3 (1994), pp. 183 – 189.
- [46] Dilip Ratha, "Leveraging Remittances for Development", *Migrati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James F. Hollifield, Pia M. Orrenius and Thomas Osang (eds.), Dallas: Texa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2007, pp. 173 – 185.
- [47] Dean Yang, "Remittances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Child Schooling and Child Labour in the Origin Households of 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Littauer Centre Working Papers*,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2008, [www.people.fas.harvard.edu/~dyang/papers/yang\\_remittances.pdf](http://www.people.fas.harvard.edu/~dyang/papers/yang_remittances.pdf).
- [48] Ernesto Lopez-Cordova and Alexandra Olmedo,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Existing Evidence, Policies, and Recommendations", *Occasional Series Paper*, No. 41 (2006), Institu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49] Devesh Kapur, "Remittances: The New Development Mantra?" *G – 24 Discussion Paper*, No. 29 (2004).
- [50] Catalina Amuedo-Dorantes and Susan Pozo, "Workers' Remittance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Paradox of Gifts", *World Development*, 32 (8) (2004), pp. 1407 – 1417.
- [51] Nicole Hildebrandt and David J. McKenzie, "The Effects of Migration on Child Health in Mexico", *Economia*, Vol. 6, No. 1 (Fall 2005), pp. 257 – 289.
- [52] Hein De Ha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Myths and Facts", *Third World Quarterly*, 26 (8) (2005), pp. 1269 – 1284.
- [53] Harold Alderman, "Saving and Economic Shocks in Rural Pakist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51, Issue 2 (December 1996), pp. 343 – 365.
- [54] [56] M. Lazaar, "The Consequences of Emigration in the Central Rif (Morocco)", *Rev Eur Migr Int.*, 3 (1), 1987, pp. 97 – 114.
- [55] E. Parrado, "U. S. Migration, Home Ownership, and Housing Quality", *Crossing the Border*, Jorge Durand and Douglas Massey (ed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pp. 318 – 320.
- [57] Devesh Kapur, "Remittances: The New Development Mantra?", *G – 24 Discussion Paper*, No. 29 (2004).

- [58] Dilip Ratha, “Workers Remittances: An Important and Stable Source of External Development Finance”, *Remittances: Development Impact and Future Prospects*, Samuel Munzele Maimbo, Dilip Ratha (ed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2003, pp. 17 – 52.
- [59] Maurice Obstfeld and K. Rogoff, “The Six Major Puzzles in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 *NBER Macroeconomic Annuals* (2001), pp. 339 – 390.
- [60] Sohail J. Malik and Naeem Sarwar, “Some Tests of Differences in Consumption Pattern: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Using Household Income Expenditure Survey of Pakistan 1987 – 88”,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32 (4) (1993), pp. 699 – 711.
- [61] Ghulam M. Arif, “Remittances and Investments at the Household Level in Pakistan”, *PIDE Research Report*, No. 166 (1999).
- [62] Pablo Antonio Garcia-Fuentes and P. Lynn Kennedy, “Remitta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Selected Paper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Southern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Atlanta, Georgia, January 31–February 3, 2009.
- [63] [64] [66] [67] 世界银行: 《2006 年全球经济展望: 移民及其汇款的经济影响》, 第 98 ~ 99 页。
- [65] Dean Yang, “Coping with Disaster: The Impact of Hurricanes o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1970 – 2001”, *Ford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Working Paper*, No. 2005 – 003, <http://ssrn.com/abstract=697521>.
- [68] Kevin Mellyn, “Worker Remittances as a Development Tool: Opportunities for the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3), pp. 1 – 18.
- [6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ization and External Imbalances”,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III, Washington, DC: IMF, April 2005.
- [70] Ralph Chami, Adolfo Barajas, Thomas Cosimano, Connel Fullenkamp, Michael Gapen and Peter Montiel, “Macro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Remittances”, *IMF Occasional Paper*, No. 259 (2008).
- [71] Riccardo Faini,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Growth*, Italian Ministry of the Economy and University of Brescia, 2002, pp. 1 – 15.
- [72] Prachi Mishra, “Macroeconomic Impact of Remittances in the Caribbean”, Unpublished paper, Washington DC: IMF, 2005.
- [73] Andrés Solimano, “Workers Remittances to the Andean Region: Mechanisms, Costs and Development Impact”, *Paper Prepared for the Multilateral Investment Fund–IDB’s Conference on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Quito Ecuador, May, 2003.
- [74] Paola Giuliano, Marta Ruiz–Arranz, “Remitt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MF Working Paper* (WP/05/234. 2005).
- [75] Ralph Chami, Connel Fullenkamp, and Samir Jahjah, “Are Immigrant Remittance Flows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IMF Staff Papers*, 52 (1) (2005), pp. 55 – 81.
- [76] Deepak Nayya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s a New Global Governance: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considered*, Joseph Stiglitz and Narcis Serra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270 – 290.
- [77] Robert E. Looney,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Worker Remittances on Arab World Labour Export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28, No. 1 (1990), pp. 22 – 45.
- [78] Dilip Ratha and William Shaw, “South–South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112, Development Prospects Group,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pp. 11 – 13.
- [79] Andrés Solimano, “Remittances by Emigrants: Issues and Evidence”, *New Sources of Development Finance*, A. B. Atkinson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7 – 199.
- [80] Manuel Orozco, “Hometown Associations and Their Present and Future Partnerships: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ter–American Dialogue*, Washington, DC: 2003, pp. 1 – 55.
- [81] [82] Manuel Orozco and Rebecca Rouse, “Migrant Hometown Association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A Global Perspective”,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and Inter–American Dialogue*, 2007, [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http://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

org/USfocus/.

- [83] Ilene Grabel, “Remittanc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38 , No. 4 ( Winter 2009 ) , pp. 86 – 106.
- [84] Peter Gammeltoft, “Remittances and Other Financial Flows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Vol. 40 , Issue 5 , Special Issue 2 (2002) , pp. 181 – 211.
- [85] Colleen Thouez,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Selected Papers of the UNFPA Expert Group Meeting* , Marrakech , Morocco , 11 – 12 , May 2005 , pp. 41 – 55.
- [86] Sharon Stanton Russell, “Migrant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Quarterly Review* 30 (3/4) (1992) , pp. 267 – 87.
- [87] Ralph Chami , Connel Fullenkamp and Samir Jahjah, “Are Immigrant Remittance Flows a Source of Capital for Development? ” Washington DC: *IMF Staff Papers* , 52 (1) (2005) , pp. 55 – 81.
- [88] Pablo Acosta , Cesar Calderón , Pablo Fajnzylber and J. Humberto López, “Do Remittances Lower Poverty Levels in Latin America? ”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Lessons from Latin America* , Pablo Fajnzylber and J. Humberto López ( eds. )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8 , pp. 87 – 132.
- [89] Edward Funkhouser, “Migration from Nicaragua: Some Recent Evidence” , *World Development* , Vol. 20 , No. 8 (1992) , pp. 1209 – 1218.
- [90] B. Lindsay Lowell and Allan M. Findlay, “Mig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Person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Impact and Policy Responses” , *Synthesis Report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 , No. 44 (2001) , Geneva: ILO , www.ilo.org/public//protection/migrant/download/skmig-sr.pdf.
- [91] World Bank,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 *Striving for Stability in Developing Finance* ,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2003 , pp. 157 – 175.
- [92] Hein De Haa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Myths and Facts” , *Third World Quarterly* , 26 (8) (2005) , pp. 1269 – 1284.
- [93] Kevin Mellyn, “Worker Remittances as a Development Tool: Opportunities for the Philippines” ,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03) , pp. 1 – 18.
- [94] Devesh Kapur, “Remittances: The New Development Mantra?” *G-24 Discussion Paper* , No. 29 (2004).
- [95] Sarah Collinson, “Shore to Shore: The Politics of Migration in Euro–Maghreb Relations” , *Middle East Programme* , London: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1996 , pp. 35 – 39.
- [96] Dilip Ratha, “Leveraging Remittances for Development” , *Migration , Trade and Development* , James F. Hollifield , Pia M. Orrenius and Thomas Osang ( eds. ) , Dallas: Texa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 , 2007 , pp. 173 – 185.
- [97] Catalina Amuedo–Dorantes and Susan Pozo, “Workers’ Remittances and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 Paradox of Gifts” , *World Development* , 32 (8) (2004) , pp. 1407 – 1417.
- [98] Akhtar Hossain, “The Real Exchange Rate , Production Structure , and Trade Balance: The Case of Bangladesh” , *Indian Economic Review* , Vol. XXXII , No. 2 (1997) , pp. 155 – 177.
- [99] Ernesto Lopez–Cordova and Alexandra Olmedo,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and Development: Existing Evidence , Policies , and Recommendations” , *Occasional Series Paper* , No. 41 (2006) , Institut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100] Nader Fergany, “The Impact of Emigration on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rab Region: The Example of the Yemen Arab Republic” ,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 16 (4) (1982) , pp. 757 – 780.